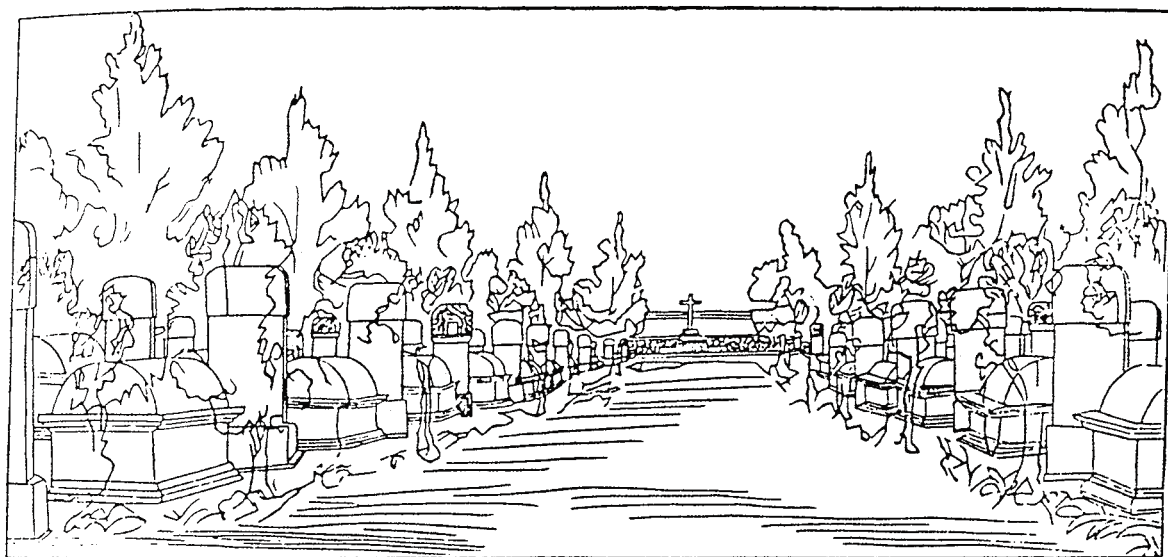


北京法國耶穌會士墓地 及錢德明神父墓碑

明曉艷*



正福寺墓地寫生圖（1900年前） 原載 Hubrecht, *Grandeur et Suprématie*, p.371.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¹⁾露天陳列區，有一處耶穌會士墓碑陳列區，陳列着明清以來入華傳教士墓碑三十六通。展區從北往南數，東側第三通碑即是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神父的墓碑。

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2/8-1793/10/8），是乾隆十五年（1750）到華的法國傳教士，當時祇有三十二歲。他知識淵博，興趣廣泛，除傳教外，把主要精力用於中國語言、文化、歷史、醫學、藝術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早把中國的古代音樂、樂器介紹到法國，在法國引起中國音樂熱的浪潮，使法國人開始瞭解中國古代音樂；瞭解中國古代音樂的組成部分“大舞”和“小舞”⁽²⁾；他把西方人稱之為中國功夫的氣功，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載入法文版《北京傳教士中國論叢》（第四卷），使一些法國醫生開始關注中國的健身療法。⁽³⁾錢德明精通滿、蒙、漢、法文，並用滿、蒙、漢、法等文字著書立說，著有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並將其譯為法文傳往西方；他以大量的文章、書簡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民俗進行論述、報道，對於法國人瞭解中國，對於“東學西傳”，特別是將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錢德明從三十二歲來華到七十五歲在北京去世並葬於北京，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四年。然而，有關他的報道和資料卻很少見，特別是在中國，在學術界。因此，在人們重新評價耶穌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時，有必要對這位鮮為人知的、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藝的傳教士漢學家——錢德明墓碑進行考證，從另一個視角來審視“東學西傳”。

* 明曉艷，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館員。



當時具體負責該項工作的石刻藝術博物館業務部主任何維良先生回憶：“當時防空洞內沒有照明，洞內污水沒膝，工作十分困難。於是，我們購



〔左上〕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耶穌會士墓碑新陳列區（由北往南） 〔左下〕（由南往北） 〔右上〕“天主堂壁”界碑

買了雨靴、雨衣和手電筒，然後接通了防空洞的照明，發現腳下的污水，原來是從地面上醬菜池子流下來的；防空洞頂部有水泥質的蓋板，也有傳教士墓碑，但傳教士墓碑不是都排列在一起的。防空洞也有岔路，在岔路或拐彎處的牆壁上，也有傳教士墓碑代替了建築材料。當時，我們按照傳教士墓碑在防空洞中的位置，繪製了一幅傳教士墓碑位置分佈平面圖。”“為了搞清這些墓碑的來歷，我走訪了當時西城醬菜廠基建科的負責人，他說他也不知道這些墓碑具體是甚麼時候拉到這兒的，祇聽說是從海淀正福寺那邊醬菜廠拉來的。於是，我們又對海淀區四季青鄉的正福寺及醬菜廠進行調查，又在村落及周邊地區找到耶穌會士墓碑十餘通，還有一

些碑座。現在石刻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傳教士墓碑中，有三分之二是從西城區月壇北街醬菜廠徵集來的，其餘是海淀區正福寺的。”^{〔4〕}

防空洞建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西城醬菜廠響應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在院內修築了防空工事。但是，用於防空洞蓋板的傳教士墓碑是如何運到西城醬菜廠的，在西城區史志資料中始終沒有找到有關的記載。除了何維良先生對正福寺的調查外，據《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頁87記載：“錢德明墓碑，正書，漢文、拉丁文；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六日卒；旁題簡歷，一張121x69，海淀區彰化村正福寺。”“正福寺位於京西四十餘里之地，為高宗賜與耶穌會士

之塋地。”⁽⁵⁾由此可見，錢德明等傳教士墓碑來自於京西四十里外的海淀區正福寺。

〈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

正福寺是繼“滕公柵欄”之後，北京又一處較大的傳教士墓地，位於海淀區四季青鄉，

〔上〕〈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
〔下〕正福寺天主堂虎皮石殘牆



（本文照片除署名者外皆由王宏輝攝影）

彰化村，原為明初大將徐達的後人所修的家廟，年久失修，早已廢棄，僅存地名，清雍正十年（1732）始，成為專門埋葬法國傳教士的公墓。近日，筆者在石刻藝術博物館藏品中發現了一通拉丁文碑，館內沒有任何有關此碑的資料，甚至沒有登載名錄。從碑刻文字內容考證，碑陽文字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文拓片⁽⁶⁾內容完全一致；拓片尺寸與碑陽尺寸相同，拓片碑陽碑文四周雕刻的中國傳統圖案——纏枝蓮，也與實物相同。但是，石刻藝術博物館藏〈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除碑陽刻有文字及圖案外，陰還刻有拉丁文：

PPCALLI. SOC IESU PROFES AN DOM
MDCCXXXII.

筆者沒有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它的拓片，據中國國家圖書館金石組藏文字資料中記載：“正福寺公教公墓記，HOC FIDEI CHRIST MONUMENTUM，正書，拉丁文，1863（同治二年）。1732年（雍正十年）賜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建，1803年（嘉慶八年）重建，1863年（同治

二年）重建”。從〈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所立時間看，這是1863年（同治二年）由遣士會重建墓地時立的碑。之後，中法外交關係緊張，教案不斷發生；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北京爆發了義和團反洋教運動，攻打教堂、毀壞墓地、殺害教士、教民；1948年解放前夕，天主教開始籌劃撤離中國，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給中國天主教修會下達了一道“緊急命令”：

“一、參加共產黨或對共產黨表示熱忱，是不合法的；二、出版、宣傳或閱讀載有共產黨人的理論或行動的書籍、雜誌、報章，或在那些刊物裡撰寫文章，是不合法的；三、凡任意作過上兩項事情的教徒，照通常原則，情性不正者，不得參與聖貞祭禮；四、信仰共產黨唯物主義，反宗教理論的教徒，尤其是那些為這種理論去辯護和宣傳，作為天主教的信徒，無條件地要受到被教廷驅逐出教的特別處分。”⁽⁷⁾ 由此可見，正福寺墓地自1863年遣使會重建此碑後，再沒有重大修繕工程，也不可能有任何復刻紀念碑的活動。因此，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正福寺公教公墓記〉

碑，當是正福寺塋地的遺存。

〈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通高72釐米，寬119釐米，厚69釐米；上部小座，高39釐米，寬77釐米，厚49釐米，質為青白石。碑頂中央處，有一直徑為18釐米，深15釐米的圓槽，是原碑安置十字架的地方

1) 碑陽：正書拉丁文，四周雕刻為中國傳統的纏枝蓮圖案。碑文為：

HOC FIDEI CHRISTI MONUMENTUM
A PR ACO DECES SORIBUS SUIIS ANNO 1732 ERECTUM
PP CALLI S J EX INTEGRO RESTAURARUNT ANNO 1777.
IMPIA MANU DESTRUCTUM ALUMNI CONGR. MISS. DENUO EXTRUXERUNT
ANNO 1863.

〔譯文〕這通表示基督教信仰的石碑，始建於1732年，1777年由法國耶穌會士重建，後又遭破壞，1863年由遣使會再次重建。⁽⁸⁾

2) 碑陰：正書拉丁文。碑文為：

PPCALLI. SOC IESU. PROFES AN DOM
MDCCXXXII.

〔譯文〕1732年法國耶穌會神父建此碑於此地。

1732年，雍正帝賜正福寺為法國耶穌會公教公墓後，有數十位耶穌會士相繼葬於此地，到1901年，正福寺墓地已有六十八通傳教士墓碑。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6日，錢德明逝世後即葬於正福寺。歷史上對正福寺墓地進行過三次大的修建，即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1863年（同治二年）和1901（光緒二十七年）年。特別是1863年，法國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孟振生（Mouly, 1807-1871）

主持的修建，規模龐大。孟振生依仗《中法北京條約》得到了清政府歸還正福寺墓地的執照。孟振生不僅“清理正福寺荒廢之塋地，使之面目一新”⁽⁹⁾，還新刻了一通〈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並立於正福寺墓地的顯赫位置。重修後的正福寺塋地，周圍建起了天主堂和教會小學。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爆發了反洋教的義



〈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碑陰



〈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碑陽碑文拓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和團運動，北京的教堂、育嬰堂、墳地，包括滕公柵欄和正福寺墓地在內的七處外國傳教士墓地均遭焚毀。不久，義和團運動被八國聯軍鎮壓，清政府於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9月，與英、法、美、德、俄、日、意、奧八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並在第四款規定“大清國國家允定，在於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已與諸國全權大臣會同商定，其碑由各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各省每處五千兩。”⁽¹⁰⁾正福寺墓地根據《辛丑條約》進行了第三次恢復和重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正福寺墓地再次遭到毀壞，如今原塋地僅存部分教堂虎皮石殘牆，及被翻修過的神父當年居住的宿舍；在虎皮牆的東側胡同南口，有一通刻有“天主堂塋”的青石界碑⁽¹¹⁾依然佇立在原地，碑石雖有些風化，但字跡清晰可見。

錢德明墓碑

錢德明墓碑通高（碑首一體）192釐米。方碑首，高68釐米，寬89釐米，厚25釐米，雕飾為高浮雕海水江崖祥雲圖案，碑額線刻十字架；碑首陰面圖案為海水江崖；墓碑碑身高126釐米，寬83釐米，厚23釐米，四周線刻花草紋案；碑陰素面。碑座高53釐米，寬98釐米，厚51釐米。正面雕有二龍戲珠圖案。質為青白石。⁽¹²⁾

碑陽中題：“耶穌會士錢公之墓”。碑文為漢文、拉丁文合璧。漢文正書，存5行66字。碑文為：

錢先生諱德明，泰西拂郎濟亞國人。緣慕精修，棄家還世，在耶穌會三十八年。⁽¹³⁾於乾隆十五年東來中華傳天主聖堂，至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卒於都城，年七十六歲。

拉丁文碑文為：

D.O.M PJOSEPHUS MARIA AMIOT. GALLUS SOC. JESU PROF. VIXIT IN SOC. ANNIS XXXVIII. IN MISS. SIN. ANNISXLIII OBITIUC PROP PEKINUM DIE VIII OCTOB. ANN. DOM MDCCLXIII ETATIS ANN. LXXV.

► 錢德明墓碑照片

錢德明小傳

錢德明神父（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年2月8日出生於法國土倫（Toulon）。1737年9月27日進入法國里昂阿維尼翁修道院，同年加入耶穌會，1746年12月21日晉鐸。1749年12月29日偕同曾在巴黎路易大帝學院就讀的兩名中國青年康斐理修士（死于海上歸途）和劉保祿神父，從里昂乘船來華。1750年7月27日（乾隆十五年）抵達澳門。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將錢德明及葡萄牙耶穌會士高慎思神父（José de Espinha）和羅啟明修士（Manuel de Matos）推薦給朝廷。乾隆帝對其已有所聞，下旨召他們三人晉京。1751年8月22日錢德明



等三人到達北京，受到了在京耶穌會神父的歡迎，數日後，謁見皇帝。錢德明負責“天神會”的兒童工作，同時研究中國語言。

錢德明與宋君榮（Antoine Gaubil 1689-1759）一樣精通滿文和漢語，但其知識更加淵博，致力於中國民族學及方言、歷史、藝術、文學等方面的研究。耶穌會會長為鼓勵錢德明從事研究工作，從1754年起，特派22歲的楊雅各伯作他的助手與學生。錢德明常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啟發楊雅各伯對歷史、考古的興趣，並教他對事物的分析技能。楊雅各伯對錢德明從事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方面給以最大幫助，追隨錢德明三十年，不幸於1784年早逝。錢德明非常傷心。

錢德明作為一名學者，以其學識淵博得到乾隆

帝的信任。他主張“以全副精力投入於學術研究的範疇，同樣是為了愈顯主榮”⁽¹⁴⁾，推動傳教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但遭到當時部分歐洲學者的質疑。他們對傳教士在中國過份熱衷於向中國傳輸西洋知識而疏於向中國人（特別是皇帝和官吏）傳教頗有看法。錢德明駁斥道：“不少傳教士雅不願為歐洲盡力：蓋吾人惟求有利於宗教科學，乃世人反將吾人最純潔清白之言變換其意而加以誣譏惡化，由是常見有反對宗教之愚暗撰述，引證吾人不惜生命以護宗教之言，事之可悲有逾此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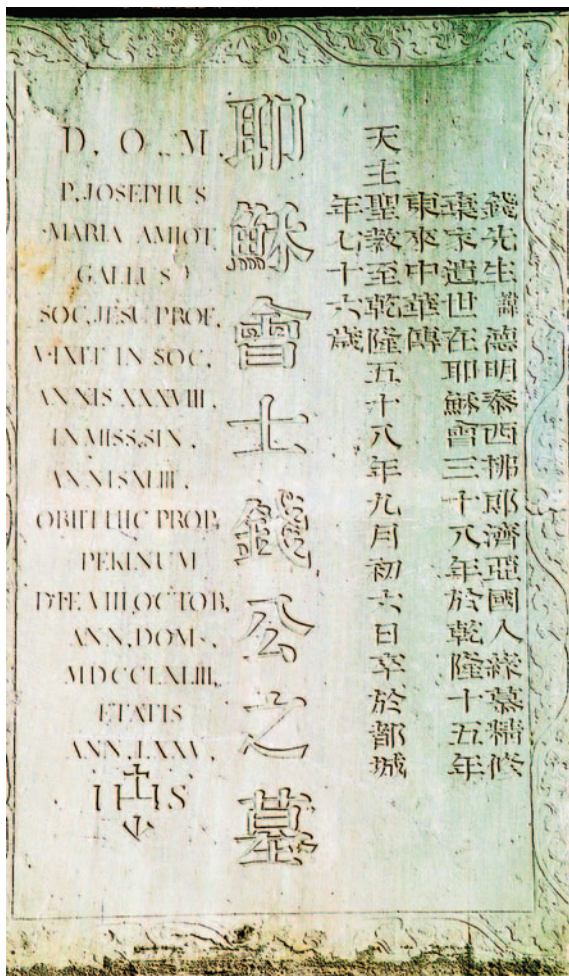
在朝廷供職的西洋教士，以忠誠之心侍奉中國皇帝，身心並不輕鬆。錢德明在描述乾隆帝時說：“皇帝的嗜好，變化無常，或喜音樂，或愛噴泉，時而大興土木，時而廣搜奇器。”然而，他們盡力奉迎，目的都是為了傳教方便，利用個人對朝廷的影響來照顧分佈在各省的傳教士們。錢德明認為“我們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各項工作，如果沒有超性德終向目的，我們微薄的才能肯定會力不勝任的。”⁽¹⁵⁾

1754年，錢德明把清朝大臣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1662-1723）著的中國古代音樂的經典著作《古樂經傳》譯成法文，寄往法國。1776年錢德明將他關於《中國古今音樂篇》的書簡和兩份手稿寄往法國。除此之外，錢德明還先後將大量中國樂器和中國樂器文獻一同寄往法國，在18世紀的法蘭西王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人們圍繞錢德明的論著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國音樂的熱潮。

1761年，錢德明被任命為法國傳教會司庫。

1765年，錢德明被聘為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通訊院士，編纂《文學書簡集》、《中國雜纂》，是當時北京最引人注意的傳教士之一。

1769年，錢德明將北京國子監街內的石鼓文抄錄下來，後來寄往法國。石鼓文文體為四言詩，內容是歌頌周宣王田獵的故事，故又稱為“獵碣”；其文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學術界認為，錢德明是繼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emare, 1666-1735）和宋君榮神父之後，對科學和文學方面



◀ 錢德明墓碑碑陽碑文照片



最有貢獻的法國來華傳教士。

1773年羅馬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穌會。1775年在北京宣佈了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穌會的諭令。

1779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簽署了給法國中國傳教區會長的諭令：當晁俊秀神父不能行使職權時，由錢德明充任此職。

1780年錢德明被推舉為北京地區宗座代牧。

1783年當遣使會來北京接替最後一批耶穌會會士時，乾隆帝擬派一個使團去法國謁見法王路易十六，錢德明將隨使團赴法。⁽¹⁶⁾

1793年1月2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10月8日消息傳至北京，錢德明即雙膝跪地為此不幸的君主祈禱。當日北京的法國傳教士為路易十六舉行彌撒。10月8日夜，錢德明突然中風，病逝於北京，享年76歲，在華四十三年，葬於彰化村正福寺。

錢德明畢生著作甚豐，主要有：

《滿語詞典》（*Mandchon is aboukka bitkhe*）：法文版，1752年在北京刊行，漢文稱《清文彙書》。

《中國歷代帝皇紀年表》：1769年北京刊印。

《乾隆御制盛京賦》（*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1770年出版，巴黎。

《有關通古斯（*Tourgouths*）族三十萬移民從裡海沿岸進入中國的石碑的譯文》：1771年11月8日北京出版。

《中國兵法考》（*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1772年出版，巴黎。

《中國古史實證》（*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1775年撰於北京。

《中國古今音樂記》（*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1776年北京完成，巴黎。

《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彙》：1783年北京刊行。

《孔子傳》（*Vie de Kong-tse*）：1784年北京完成，巴黎。

《歷代和當代中國各藩屬的介紹》：1787年北京出版。

《滿洲語文典》（*Grammaire tartare-*

mandchoue）：1788年出版，巴黎。

《滿法辭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dchou-français*）：1789~1790年出版，巴黎。

《滿族勝利的頌歌》法譯本，1792年M. Langlès 發行，巴黎版。

《滿洲禮規》：1804年，巴黎出版，Langlès 刊行。

〈針灸穴位銅人像，供學習之用〉：伯希和，《通報》1921年，頁231。

〈有關中國古代宗教儀式中歌舞的紀錄〉：伯希和，《通報》1928年，頁47。

〈論中國的理學和有關書籍〉：M. Bonnetty 在《哲學年鑒》刊載。

〈論中國功夫〉載（法）《北京傳教士中國論叢》第四卷。

另外還有書紮七十餘通，涉及宗教、歷史、文化、藝術等。

錢德明的遺囑是用法文和中文寫成的，摘要如下：

當我從1749年離別祖國到中國後，我始終是修會會士。我處在地球的一隅，一切遵循修會的會章而生活，所以在此期間，我沒有財物……

自從我經常引以自豪的這個修會組織被解散後，如果我願意的話，我也可以有所積儲，但我沒有這樣做，所以我一無所有足以留下來……

我也沒有欠下債務；我動用的都是我能夠動的，陸續來自哀矜和地方上的禮尚往來所提供的；至於衣服家具和其他零星物件，還有來自饋贈的禮品，均歸住院所有……

我的寫作，沒有值得寄往海外的內容。我的意見：除了由我負責的那些通訊資料應抽出加以處理外，其餘積存的稿件，全部焚燬。

至於從歐洲寄給他的物件，他也作了安排：原由他本人使用的物件，交由教區領導處理，除了其中一套修理鐘錶用的工具，因為他的一名傭人曾希望得

到它。至於手頭的現款，平分為三，分別留給兩名傭人和多年同事楊雅各伯的兒子：

這是區區之數，為一家三十多年來一直在誠懇、熱忱、忠心地為我服務的、世所罕見的模範人家，略表心意……

Amiot, M.A. (簽名)

這份遺書是多年前寫就的；今重讀一遍，我認為沒有修改的必要。

1791年11月15日

Amiot, M.A. (簽名)⁽¹⁷⁾

小 結

自利瑪竇來華至後來的大批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成為東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文化交流，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交流不僅是在宗教上的，更為重要的是，有了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使閉關鎖國的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成為“西學東漸”的開端。但是，近百年來，一些學者在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時候，過份強調“西學東漸”而忽略了“東學西傳”；忽略了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產生的影響。

在對錢德明墓碑、其人考證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錢德明不像利瑪竇、郎士甯、張誠、白晉等廣為人知，但錢德明在向中國傳授科學的同時，也將中國的文化、醫學、史籍經典、藝術等傳入法國、傳入西方，使更多的西方人瞭解中國，使中國文化也深深地影響了西方國家，特別是對法國文學、藝術、哲學，應該承認錢德明在這方面有着更為突出的貢獻。在討論“西學東漸”的同時，更應關注“東學西傳”的影響。

目前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展出的三十六通清代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墓碑中有十人經澳門進入內地或在澳門進行過宗教活動，如雷孝思、巴多明、馮秉正、蔣友仁等，他們從不同的側面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過貢獻，這些墓碑為進一步的考證、研究耶穌會在華活動提供了實物佐證。

【註】

- (1) 石刻藝術博物館是以收藏、研究、展示北京歷代石刻文物為主的專題性博物館，位於北京市海澱區五塔寺村24號，原明代真覺寺（俗稱“五塔寺”）內。2000年開始閉館進行建寺五百年來最大規模的修繕工程，調整露天展區的佈置，於2002年10月1日以嶄新的面貌重新開放。
- (2) 《中國大百科全書·舞蹈卷》：“大舞”，又稱“六代舞”，相傳是中國黃帝、唐、虞、夏、商、周六代的祭祀樂舞，總稱六代舞，也叫六樂。六代舞開中國古代雅舞之先河，代表古樂舞之正統，是封建社會禮教的一種象徵。六代舞到春秋以後，受到民間俗舞與宮廷女樂舞蹈的衝擊，名存實亡，終於變成了宮廷祭祀中的禮儀程式。但經儒家的推崇鼓吹，概括為文舞、武舞，象徵文治武功兩種統治方略，作為華夏禮教的正統儀典。歷代帝王無不因襲製作以祭天祭祖，歌功頌德，一直傳到清末。“小舞”：周代舞蹈。主要用於祭祀。有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六種形式。周代將小舞列為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小舞名稱始見於《周禮》，明代朱載堉解釋：“小舞又別於大舞（六代舞），不須按舞佾（列隊）規定，一人也可舞……故稱小舞。”
- (3) 法《法國遠東學校公報》1966年，頁75。
- (4) 筆者於2002年9月17日採訪了原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業務部主任，現為北京文盛房地產公司總經理的何維良先生，記錄並整理。
- (5) 《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第105頁記載了〈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拓片的內容：“正書 拉丁文 1863年（同治二年） 1732年賜地 1777年建 1803重修 1863 重建 一張 32x119 海澱區彰化村正福寺”
- (6)(9) 《清末北京志資料》張宗平、呂永和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月。
- (7) 《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五期，1951年9月。
- (8) 碑文中沒有提到“1803年（嘉慶八年）重修”。
- (10) 《基督教與北京教堂文化》，頁337，佟洵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 (11) 《基督教與北京教堂文化》，頁339，記述：一尊刻有“天主堂”三個字的界石仍在原地立。許多文章都祇引用“天主堂”三字，其實是“塋”字被埋在土下使然。“塋”字下是否還有“地”字，因該界石鑄在水泥路面之中，無法挖掘，待考。
- (12) 墓碑出土時，碑身作為防空洞蓋板，碑座不知去向。現存碑座為博物館後配置，非原物。
- (13) 錢德明墓碑漢文碑文記述：錢德明“在耶穌會三十八年”。按：耶穌會於1773年被解散，而此諭令於1775年才到達中國。錢德明於1737年9月27日在法國阿維尼翁修道院入會，“在耶穌會三十八年”，是按1775年計算的。如按1773年計算，則在會時間應是三十六年。
- (14) 《書信集》列傳P1036 de Bacher，《耶穌會士著作文集》，頁27。
- (15) 《書信集》卷四，頁56-57。
- (16) 1783年12月7日教廷傳信部的一道指令：由遣使會會士接管已解散的耶穌會在北京的事業；他們於1785年到達北京。（de Backer,《文集》頁28。又 Rochemonteix 的《錢德明神父傳》頁391起。）
- (17) 《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